

壹、前言

去年三月初，中國時報報導，因為持續二、三年的美國經濟不景氣和偏高的失業率（百分之十），使得高等教育受創嚴重，尤其是公立大學；從東岸紐約州立和市立大學學生到美西的加州大學校園，經常出現抗議學費高漲和課程減少的示威隊伍（林博文，2010）。

其實不只美國，全球各地高等教育財政惡化的情形由來已久；多數人均認識到教育是協助個人向上流動的推力，知識已成為經濟的核心；從開發中國家到已開發國家，年輕人蜂擁進入大學殿堂，尋求人生開展的理想；高等教育由菁英教育，轉為大眾教育，入學人數快速成長，高等教育經費，遂成為政府的沉重負擔，不得不採取緊縮的政策。

首要原因，國家整體經濟榮景下滑，導致稅收萎縮；俄羅斯和許多蘇聯解體後的新興國家，和大部分的非洲國家，整體生產毛額停滯或甚至下降，經濟前景黯淡，當然影響稅收；其次，受到全球化的影響，使資金、資訊和生產力，在國際間快速流動，也影響政府課稅的金額；其三，教育失去優先性，高等教育在日益珍貴的稅收資源中，已經失去優先性；在長長的需求隊伍中，中小學教育、健保、公共建設、住宅、照顧貧困老人、兒童、遊民都比高等教育排序居前（Johnstone,2006）。

高等教育對經費緊縮的典型反應，是提升辦學效能，如提高學生入學標準，消除冗員，裁撤部門等措施；另外拓展收益亦有五個管道：一、由政府、納稅者負責經費；二、家長自行支付；三、學生打工、請領獎助學金或申辦助學貸款；四、捐贈者支付，富有的家長付較高的學費，清寒者少付一些；五、學校企業收益，出售學校資產或推廣教育增加所得；五種管道，各有其限制。為減輕高等教育對政府的依賴，各國政府皆鼓勵高教學府自籌部分經費（Johnstone,2006）。

台灣亦有此趨勢，自1997年國民大會刪除教科文預算的下限後，教育經費分配，一改往年偏重高等教育之方式，轉以國民教育為主，大學院校的資源逐年減少；加上「廣設高中大學」的教改論點，導致大學院校數量飛快擴充，學生人數急速增長，造成經費嚴重的排擠效應；但是大學主要的收入來源：學雜費，自九十四學年度開始，幾近凍漲，各公私立大學財務益形艱困，如此的辦學窘境下，最具彈性者莫如捐贈收入，因此有效勸募溝通策略的擬定，成為大學院校著意經營的重要課題（張志賓，2004）。

其實遠自1996年起，教育部陸續分批擇校實行「校務基金制度」，且規範學校自籌部分經費，公立大學經費自籌比例20%至23%，其中除15%為學雜費收入